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

〔德〕阿尔伯特·冯

勒柯克 著

陈海涛 译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队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

〔德〕阿尔伯特·冯

勒柯克 著

陈海涛 译

责任编辑 李春华
责任校对 卢 艳
张 利
封面设计 王国玲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By Albert von Le Cop

1928, London.

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

[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著
陈海涛 译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电话:2825887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 新疆地矿彩印厂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1/32 850×1168(mm)
印张 8
插页 36
字数 250 千
版次 1999年2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8-04801-6/K·618 定价:28.00 元

勒柯克其人其事

(代序)

荣新江

1. 这是一本介绍本世纪初叶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第二、三次到新疆考察的通俗读物，作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是这两次考察的主角，在第二次探险过程中，他任队长；第三次探险队时，也是队中主力。但在第三次探险中间，由于身体不适，勒柯克提前回国。书中以他的活动为主，所以对第三次的考古探险活动的描述不全，却随着他本人的经历，记录了一段其他队员所没有的翻越喀喇昆仑山的惊险故事，更有可读性。

这本书原为德文，1926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题为《新疆古希腊化遗迹考察记》(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ürkistan)。强调新疆的希腊化遗迹，是贯穿勒柯克全书的主观意旨，因为他是从西方文化来看待新疆古代文化遗产的。两年后，这本书就由巴威尔(A. Barwell)译成英文，题为《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在英国伦敦出版。英译本的名字更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英语读者更多，理所当然，英译本也就更为畅销。

1934年，郑宝善据英译本译成中文，题为《新疆之地下宝库》，由南京蒙藏委员会出版。这个本子流传不广，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而且，作者对新疆的小地名全用音译，时过境迁，这些译名今天看

起来已十分费解,如译胜金口为“山奈阿盖子”,译柏孜克里克为“巴塞克利克”,译七康湖为“支堪考耳”,译吐峪沟为“杜窑克”,译克孜尔为“开塞”,译名都没有附原文,即使重印,今天的读者也很难把握。

大约同时,向达先生也翻译了此书,题作《勒柯克高昌考古记》,显然是想和他所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成为姊妹篇。但从现存的稿本看,全书尚未译完,已译的部分也有许多专有名词空缺待补。和《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样,向达先生译本也是使用的半文言文,对今天的一般读者不太习惯。中华书局曾有意出版,但最终未果。

南开大学陈海涛君,曾师从兰州大学杜斗城先生治河西史地,且留心中西文化交流史迹。数年来京收集资料,提到他正翻译勒柯克此书,因鼓励他早日完成。陈君利用业余时间,奋力完成。又得到精于西北探查史的王冀青先生和吐鲁番史的杨富学先生之助,反复修改,克臻完善。笔者因执编校之役,校读一过,略缀数语,聊作序言。

2. 所谓“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是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在德皇和军火大王克虏勃等人的资助下,在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13—1914年间所派出的四次新疆考古探险队,虽然名为“吐鲁番探险队”,实际发掘古物的地点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东到哈密,西到喀什,包含了整个丝路北道的古代遗迹。探险队对新疆丝绸之路北线所经过的主要遗址都做了调查和发掘,获得大量写本、刻本、绢纸绘画、雕像等,并用切割的方法剥取了大量的石窟壁画。其所获古代文物,用勒柯克在本书中的统计,共有:第一次46箱,每箱重37.5公斤;第二次103箱,每箱重100—160公斤;第三次128箱,每箱重70—80公斤;第四次156箱,每箱重70—80公斤。也就是说,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资料最初入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

(Museum für Volkerkund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藏在各地, 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东德所藏以文献为主, 后均入藏于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 (Zentralinstitut für Alte Geschichte und Archäologie), 西德所藏的一批文献材料, 于 1947 年转移到美因兹 (Mainz) 收藏, 约有数百卷, 后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 (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东方部 (Orientabteilung), 而藏在各处的文物资料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MPK) 收藏。两德统一后, 凡文献类材料一律归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文物材料一律归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

3.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家中, 勒柯克虽然没有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有名, 但也算是一位极富冒险精神的人。

勒柯克 1860 年出生在柏林, 是个制酒商人的儿子, 家境富裕。但他不认真读书, 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学校开除。以后, 被先后送到英国和美国, 受商业训练, 同时钻研医术。27 岁时, 他回到德国, 加入他祖父创立的勒柯克酒业公司。但他对经商没有兴趣, 13 年后, 他卖掉了这家公司, 移居柏林, 进入东方语言学校学习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 以后又学习梵语, 受到较好的东方学训练。1902 年, 当他已经 42 岁时, 进入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印度部工作, 而且是不领薪水的白干。

然而, 作为一个后来以探险家而闻名的他, 此时加盟柏林民俗学博物馆, 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正等待着他。当时, 格伦威德尔正率领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奔赴新疆。一年后, 探险队带着丰富的收集品和大量考古信息回到了柏林, 并且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吐鲁番考察活动。1904 年, 由于第一次考察队队长格伦威德尔身体不适, 而另一位队员胡特 (G. Huth) 已经去世, 勒柯克作为博物馆的无薪人员, 被选为第二

次吐鲁番考察队的队长，带领切割壁画的能手巴图斯一道东行。勒柯克在第二次和接下来的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中的探险生涯，特别是他押运探险队收获品的行李翻越喀喇昆仑山的惊险遭遇，读者可以在本书中领略一二。

勒柯克还是德国第四次吐鲁番探险队的队长。当他着手准备这次探险时，由于满清王朝的覆灭，新疆政局处在混乱之中，德国外交部警告勒柯克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在库车精美壁画的诱惑下，勒柯克和巴图斯不听劝告，签下生死书，不计后果地于1913年5月奔赴新疆，在库车和巴楚地区作了大规模的发掘和揭取壁画的活动，于1914年1月回国。他此行的探险行记是《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探险报告》(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ü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1928年在莱比锡出版。

4. 勒柯克想把一切可以带走的文化宝藏都带走，他的理由是“当地农民的无知、伊斯兰教徒的愚昧和地震的破坏”(见霍普科克的导言)，为此他在本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生动地描写当地农民在许多方面的无知，也带着强烈的宗教偏见来诬蔑伊斯兰教徒，他还在几处和一些图版的说明里，特别标出哪些洞窟在他走后的地震中坍塌。

然而，即使是他的上司格伦威德尔，也是不赞同勒柯克的做法的，因此两人之间产生了不少的矛盾，在本书的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真相。格伦威德尔曾要求勒柯克保护木头沟的寺庙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原封不动地留给他来处理。但后来因为格伦威德尔没有及时赶来，勒柯克便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切割式发掘。他的挖宝式“考古”，使得后来的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也不敢恭维。斯坦因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德国曾以独特的方式挖掘过(吐鲁番的遗址)，并且所有地方都挖掘得很彻底。……大寺院、庙宇都是用学术盗宝者的方式挖掘的，简直没有使用任何考

古学周密仔细的方法。”(《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中译本 288 页)

勒柯克大概没有想到中国人还会有有一天能够读到他的书，所以在书中详述了“拥有像希腊罗马神话中大力神赫克里斯般神力的巴图斯大师”切割壁画的方法和过程。从今天的道德准则来看，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能容忍勒柯克和巴图斯对待新疆地下宝藏的残暴手段。

勒柯克以当地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为他掠夺宝藏的理由，但是我们细读他本人的书就可以发现，他是动用了大量民工才攫取到那些最为精美的壁画、雕像、写本的，按照清朝和民国年间新疆当地的挖宝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把它们全都破坏的。凡是到过克孜尔和库木土拉石窟的人，都可以细心地看到，窟顶上紧挨着巴图斯割掉的菱形方格图案的另外一些图画，经过这么多年的地震和“人为破坏”，依然完整无缺。我们否认当地的一些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但勒柯克和巴图斯把精美的壁面切割成块，难道不是一种人为的破坏吗？

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新疆地下宝藏的流失同样是我国学术的伤心史。遗憾的是，清朝末年的新疆官吏，对这些攫取宝藏的西方探险家们熟视无睹，任其随心所欲，甚还派人协助。在勒柯克这本书中，惟一可见的一则有关的记载，是在阿图什考察三仙洞时，勒柯克曾说：“在没有获得当地清朝官吏(道台)的批准之前，我们被禁止在任何地方进行挖掘，即使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兴趣。”显然，勒柯克知道自己的行动是非法的，但可悲的是执法者却没有真正地执法。

勒柯克对待新疆地下的文化宝藏的态度，是探险家式的，是找宝和挖宝式的，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考古。

5. 和他对待新疆文物的粗鲁相比，勒柯克在学术研究上却是细心的，由于他的刻苦精神和勤奋写作，留下了他历次考察探险的记，而且把所获得的精美艺术品，汇印成大型图录：

《高昌：普鲁士王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重大发现品图录》(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Berlin 1913), 收录了第二次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盆地, 特别是高昌故城的收获。《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 Asiens, Leipzig 1925), 是把中亚艺术与其他文化作比较研究的图录著作。他和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合编的七卷本《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VII, Berlin 1922—1933), 展现了新疆古代石窟和寺院昔日灿烂的文化色彩。

勒柯克通晓多种东方语言, 并且从现代维吾尔语进入到古代回鹘语, 成为整理研究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回鹘语文献的主要人物。早在1908年, 他就发表了《亦都护城发现的回鹘文摩尼教残卷》(Ein manichäisch-ugurisches Fragment aus Idikut - Schahri, SPAW 1908, 398—414), 解读了新发现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 这些摩尼教文献实为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 引发了迄今久盛不衰的摩尼教研究热潮。此后, 他又接连发表《吐鲁番发现的东突厥语文献——吐鲁番绿洲吐峪沟和亦都护城发现的如尼东突厥文写本残卷》[Koktürkisches aus Turfan. Manuskriptfragmente in koktürkischen “Runen” aus Toyoq-und Idikut-Schahri (Oase von Turfan), SPAW 1909, 1047—1061], 《新疆吐鲁番发现的突厥文基督教与摩尼教写本残卷》[Ein christliches und ein manichäisches Manuskriptfragment in türkischer Sprache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SPAW 1909, 1202—1218], 《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徒忏悔罪过书》[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 Gefunden in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APAW, 1910, Anhang 4] 等等, 涉及古代新疆历史、宗教、文化诸方面。他的《高昌突厥语摩尼教文献集》三篇长文

(Tu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II, III, APAW, 1911—6; 1919—3; 1922—2), 系统刊布了吐鲁番出土的突厥回鹘文摩尼教文献, 成为此后研究高昌摩尼教的主要史源。

6. 勒柯克其人其事, 并不可能在一篇短序中交待全面, 以上仅仅从作为探险家、挖宝者、学者三个方面, 略加介绍。

对于 100 年后的中国年轻人来说, 这部书和同时代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著作一样, 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探险故事。在这些不顾性命的西方探险家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畏艰难的精神, 感受到当年西方学术敏锐的触觉。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 我们需要有像勒柯克、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 他们既富有探险的精神, 也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勒柯克的书, 既是一部探险游记, 又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

1998 年 5 月于北京大学

英文重印本导言

彼得·霍普科克^①

1895年的冬天，一个年轻的瑞典探险家历尽艰辛，翻越了如同恶梦一般的帕米尔高原之后，到达了一个遥远的中国边境小城——喀什。他就是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这里的一些位于绿洲上的城镇中，他听到了许多奇妙的传说：有一些充满财富的城市被埋在了暴戾恣睢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这是真主在很久很久以前，因为这些城市中居民邪恶、不端的行为，而把他们埋起来的。几乎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去面对大沙漠自然的与超自然的这种恐怖。但斯文·赫定却坚信，就在那里存在着传说中所提到的巨大财富有待发掘。

很快，斯文·赫定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在那些听起来不足为信的奇妙传说背后，确实揭示出了一些秘密。就在他第一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探险活动中，在几乎被渴死之时，他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到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却充满财富的古代小城废墟边。然而更重要的是，斯文·赫定从他的第一次探险所发现的废墟中带回来的那些手工制品，证明了在距今9个世纪，伊斯兰教还没有征

① 彼得·霍普科克(Peter Hopkirk)：他关于中亚探险家们的著作有三本，即《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翻过世界屋脊的人们》(Tran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探索东方的光辉》(Setting the East Ablaze)。

服中亚之前，这个现在已消失的城市曾经是一个典型的佛教社会。

从这以后，先后有来自 7 个国家的考古学家与探险家开始了沿着丝绸之路——古代连接着东西方两大帝国(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大通道——发掘出了许多被风沙所掩埋的古代城市废墟。斯文·赫定令世界瞩目的发现，标志着一场国际间的、自由的对那些久已失落的古代佛教文明的宝贵艺术财富的掠夺的开始。今天，使许多中国学者们所懊恼的是，这些在此地所发现的艺术财富，至少被收藏在全世界 13 个国家的博物馆中。

第一位从印度翻过喀喇昆仑山(Karakoram)进入中国的探险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东方学家奥利尔·斯坦因(Aurel Stein)。他本是一位匈牙利人，后来却成为了英国公民。他长久以来就一直在怀疑，有某一种已失落的古代文明被埋在中国西部的沙漠之中。在他之后，接踵而至的，还有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们，德国、日本、俄国、法国，最后是美国。

从这条古老而遥远的大通道附近的城市、坟墓、寺庙废墟中，这些考古学家们设法搬走了几乎成吨的巨大的壁画，几千件雕塑，大量精美的丝绢画和珍贵的古代文献写本以及其他的古代文物。这些文物清楚地反映了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的传入，在当地分散在众多绿洲上的城市中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一种佛教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了印度、中国、波斯以及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古典希腊艺术的一些风格特点，从而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西域艺术。

然而就在那时，丝绸之路开始慢慢衰落了。随着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丝绸之路这一地区控制权的丧失，掠夺成性的匈奴人以及其他一些好战的游牧部落开始占据这一地区。这样，东西方之间的交通陷入停顿。并且由于此地沙漠绿洲中人们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灌溉系统的忽视与破坏，这些绿洲上的居民们不得不远走他乡。最后，大约在公元 10 世纪，整个这一地区陷入伊斯兰教徒们的弯

刀之下。

那些曾经一度繁荣富饶的城镇现在一个个都变成了魔鬼的城堡，里面只有怒吼的狂风与飞舞的黄沙。长期以来，随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不断的吞蚀，这些城镇以及那些它们曾经孕育出的文明，都一同被埋葬于无情的黄沙之下，长久地被人们所遗忘。流传下来的，只有那些神奇的传说，也正是靠着那些传说，斯文·赫定才在许多个世纪之后，来到这里并找到了它们。

在这场探险挖掘古代文明的竞赛中，除获得最大成功的几国，接下来就要数德国人了。他们在1902—1914年间，曾派出过四次考察队前往中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察发掘。第一次考察活动是由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教授领导的，他是一个杰出的佛教艺术史学家，来自柏林的国家民俗学博物馆，是那里的印度部主任。

在德国军火大王弗里德里希·克虏伯^①的大力支持之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考察队在这一地区活动了近一年时间，主要发掘了吐鲁番地区(Turpan)，并带回了46箱的古代文物。第二次考察活动原定在1904年进行，但这时格伦威德尔因为身体不适，不宜再进行长途旅行，因此，需要寻找一位临时的考察队负责人。但是事先说明一旦格伦威德尔身体康复，他可以随时加入考察活动。

这个被临时选中的人，就是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即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富有的胡格诺派教徒酒商的儿子，在他回到德国西南部城市达木士塔(Darmstadt)接管他的家业之前，他曾经生活在英国和美国。但他从没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他的商业活动上，13年之后，他就放弃了他的家业而去追求他自己

^① 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 1870—1950)，德国大军火工业资本家，为该家族第四代。该家族1811年在埃森建立克虏伯铸铁厂，并将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铸铁厂，逐渐发展到制造枪炮、造船等。

所热爱的事业，这就是中亚历史和语言。首先他来到柏林，花费几年时间学习了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和梵文。在1902年，当他42岁时，作为一名不付报酬的义务人员，来到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印度部工作。这时，正是格伦威德尔前往中国新疆进行他的第一次探险活动之时。

对于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的能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在这里，我更想强调他的毅力，正是由于这种毅力，在两年以后，这个年近中年的学者领导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探索活动，这次探索活动，就连当时的德国皇帝本人也觉得非常有兴趣。陪着勒柯克来到吐鲁番并在那里展开了大规模发掘活动的，只有一个人，即强壮的瑟奥多·巴图斯(Theodor Bartus)，他只是博物馆的一名勤杂工，他也参加了由格伦威德尔所领导的第一次考察。

在几个月之后，格伦威德尔才同他们会合，但在此之前，他们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已经在100多只箱子中装满了从墙壁上锯切下来的壁画（它们都是由巴图斯很小心地锯切下来的，以便可以更容易、更安全地运输）、雕塑、文献写本以及其他一些珍贵文物，就净重来讲，这些东西是第一次考察活动结束后格伦威德尔带回柏林的收集品的8倍。

在他们的众多让人惊叹的发现之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在柏孜克里克(Bāzāklık)凿刻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巨大寺窟中发现的规模宏大壮观的公元9世纪时期的壁画。直到今天，尽管有许多旅游者去过中国，但因为柏孜克里克地处偏僻，极难到达，许多人依然对它一无所知。这些壁画常被锯成三部分，先由骆驼运到离此往西大约要有一千多里远的最近的位于俄国突厥斯坦的一个火车站。

在柏孜克里克的一个寺窟中，冯·勒柯克和巴图斯锯切下来了15幅巨大的有关佛陀的壁画，这些壁画都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为了避免在运送它们的长达20个月的旅行中对它们的不

必要的损坏，壁画的每一部分都被细心地包捆，首先是棉花，然后用毛毡，最后再用干草。然后再把它们背靠背，中间垫上木板，紧紧地用绳子捆扎起来，最后再放在箱子中，箱子里面用稻草垫实，外面再用钉子钉紧。

就这样，在酷热与尘土中，冯·勒柯克和巴图斯忘记一切地工作着，恨不得把所有他们能带走的都带走。每一次他们到达一个新的考察地点，他们都在那儿进行了这种切锯活动。另一方面，在丝绸之路的其他一些地方，他们的竞争者们也都在干着这些同样的勾当。在1906年，当斯坦因翻过喀喇昆仑山，刚刚结束他的四次考察活动中的第二次考察时，参与这场竞赛的一名新的竞争者接踵而至，他精通13门语言，包括汉语，他就是杰出的法国年轻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几乎在同时，日本和俄国的考察家们也开始在这一地区活动。

在我的《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这本书中，我曾经讲述过关于在丝绸之路上为掠夺财富他们之间互相比赛的故事，由于这是一个比较长而复杂的冒险故事，我不便于在这儿引述。另一方面，对于德国考察队在他们的考察期间的冒险与不幸，也正是本书的主题，因此由冯·勒柯克本人亲自来对此进行讲述应是最好的方式。然而，在此让我们回忆为什么冯·勒柯克错过了去得到丝绸之路上那最大的一笔财富的原因，还是很有价值的，更不用说这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在柏孜克里克取得重大收获之后，冯·勒柯克和巴图斯收到了一封格伦威德尔给他们的信，信中说他已经完全康复，正在前往喀什(Kashgar)的路上。喀什在柏孜克里克以西约一千多公里。格伦威德尔要求他俩前往那里同他会合，至于为什么格伦威德尔不能前往东部与他俩会合，就不得而知了。

正在他们两人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喀什之时，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在一个叫敦煌的石窟群中，有一个中国的道士在洞窟的一堵

隔墙背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神秘的古代文献写本的藏书库。从这儿前往敦煌需要向南穿过沙漠走大约 17 天的路程。这也就是说如果要去敦煌，来回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但现在距格伦威德尔要求他们的前往喀什的时间已经晚了。并且在以前，他们也曾轻信过类似这样一个传说，最终除了浪费了一些时间外，一无所获。

因此，冯·勒柯克拿出一枚中国的金币，决定用抛金币的办法来选择取舍。结果，是金币的背面，这也就是说他们要前往喀什同格伦威德尔会合，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把这一极其珍贵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斯坦因。以后，斯坦因成功地将大量的敦煌文献写本运到了英国，其中包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一事件，对冯·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他俩之间再没有和睦过。这种结果部分地也归因于他们之间性情上的差别，并且他们两人在是否将壁画从它们的原地移走这一问题上也有意见上的分歧。

格伦威德尔认为壁画应该放在它们的原地进行研究，而不应把它们搬走。然而冯·勒柯克却一直坚持必须要对它们进行保护，运到安全的欧洲去。这一观点上的不同经常导致两人的争吵，在这一过程中，冯·勒柯克经常是因为相对精力充沛而获得胜利。他之所以坚持要大规模移走这些珍贵财富的理由，也正是他在这本书中所讲到的，是因为它们正遭受着人为的以及自然的两方面的破坏。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一辩解，正好印证了这批文物后来的命运，尽管冯·勒柯克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国人不得不结束了考察活动。但即使在这时，斯坦因却还在继续着他的探险。几乎同时，法国人伯希和也从仍然存放在敦煌藏经洞中的众多珍贵文献写本中，取走了不少。这就是说，就像类似的许多事情一样，直到当时北京的中央政府重视在他们帝国的一个边远角落里发生的这件事时，这